

百年
文学
论丛

Bainian
Wenxue
Luncong

周保欣 ● 著

沉 默 的 风 景

——后当代中国小说苦难叙述



安徽教育出版社

Bainian
Wenxue
Luncong

百年
文学
论丛

周保欣 ● 著

沉默的风景

——后当代中国小说苦难叙述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风景：后当代中国小说苦难叙述 / 周保欣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12

(百年文学论丛)

ISBN 7-5336-4313-5

I. 沉... II. 周...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210 号

责任编辑：丁蔚

装帧设计：朱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东方红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7.875

字 数：190 000

版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13.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551)2822632

邮编：230063

出版者言

《百年文学论丛》继《海棠文丛》（一、二辑）、《金蔷薇论丛》之后面世了。这是一套专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丛书。文学在上个世纪是一个显赫的文化艺术门类。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它是文化变革的最重要生力军，新文化运动中，很难想像没有新文学运动；同时文学又是社会变革的武器，参与了血与热的社会斗争。总结研究这个世纪的文学一直是文学研究者、文学批评者为之献身的行当，大学设有专门的学科。过去这段文学比照中国古代文学，名之曰，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以建国为界划分现当代。时至 80 年代中期有人提出“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整合现当代文学学科，运用整体眼光看待这百年的文学，而不是分段的割裂式的。这一概念已为学术界所接受。这套书原拟以“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为丛书名，但几年前我社已出过这样一套丛书，由严家炎、严云绶两位教授主编的。后改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书”，稍感老化，故改为“百年文学论丛”。运用百年文学的整体视野去研究这段文学，是这套书作者的共同追求，即便在研究某个作家，某部作品，或某个文学现象时也是如此。

百年文学，不止百年；20 世纪文学外沿已逾越 20 世纪的上下限。它的诞生点在 19 世纪末，它还正在生长蔓延，走入新的世纪、新的千年。文学批评在延展，文学研究在深化。我们这套书是这种延展、深化的一部分。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

前 言

苦难和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是世界性的文学母题之一。文革以后的当代中国作家拥有自己的历史和记忆，拥有自己的神话和传说，也拥有自己关于苦难的理解和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时期因为既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民族性苦难的终结，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层面重寻历史起点的开始，因此而充满着动荡和变异的焦灼，文学中的苦难叙述也更能折射出复杂、矛盾和游移不定的时代特性，更能表现出人类的某种根本处境。本书把文革以后的当代中国小说创作作为分析对象，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视野中，以当代中国社会状况、文化状况和文学叙述主体的精神状况为背景，考察“苦难”这一既古老而又充满当代意味的中心意象在作家内心和文本中建立起来的过程。它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其一，作家叙述了一种什么样的苦难经验；其二，这些苦难经验是怎么被叙述出来的。通过对作家苦难意识、叙述行为和作品内在题旨的把握和分析，揭示隐藏在苦难叙述中的作家的个人性因素、集体无意识，和包括其中的时代属性和意识形态特性；分析苦难作为一种记忆、经验和体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作家主体意识并且影响作家想象力的，或者说作家由此建立了一种什么样的叙述权力、观念力量和美学风格。目的是通过对作家写作行为中苦难叙述的研究，观察全球化境况下中国作家的写作经验，对自我、生命、社会、人生问题的文学关注形式，以及当代文学进入后当代时期以来的某种发展基本路向，肯定苦难叙述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可以彪炳于文学史册的文学经验。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穿越现代性压抑的文学苦难	1
第一节 叙述的背景：雪崩、夹缝与现代性压抑	1
第二节 总体把握：历史、现实、主体	5
第三节 逻辑起点：文学和人学的立场	16
第一章 历史压抑：禁忌消隐后的苦难神学	18
第一节 社会背约与苦难起源	19
第二节 在“罪”的抗辩中获救	25
第三节 现代祭祀与价值膜拜	32
第四节 起点还是终点？	41
第二章 生活苦难：后启蒙时代的日常政治	44
第一节 匿名启蒙与他者苦难	46
第二节 匮乏中的人性与道德	51
第三节 生存技术与沉痛感的浅消	56
第三章 存在压抑：非本质时代的自我迷惘	62
第一节 “被抛”的在世状态	63
第二节 存在的否定性本质	69
第三节 白日梦与远方意识	75

第四章 文明压抑：现代病理的神话延伸	80
第一节 神秘主义的文学勃兴	81
第二节 神秘受难的审美形态	84
第三节 神秘受难的精神母题	91
第四节 神秘主义的诗学建构问题	97
第五章 自我压抑：欲望的双重形象	
——以王彪小说为例	102
第一节 世俗生存的非诗性品质	103
第二节 悲剧化的寓言深度	107
第三节 无法抵达的承诺	111
第六章 当代苦难叙述的结构性分析（上）	115
第一节 受难的形态：向上与向下	115
第二节 直面的姿态：反抗与消解	120
第三节 叙述的隐喻：英雄·凡人·弱者	128
第七章 当代苦难叙述的结构性分析（下）	140
第一节 叙述的情感：抱怨与悲哀	140
第二节 苦难的价值：肯定与否定	146
第三节 审美的叙述：象征与写实	151
第八章 凝望与游离：苦难叙述的人道主义审视	
.....	159
第一节 人道主义与时代心理地形	160
第二节 苦难叙述的人道主义价值	163
第三节 虚无与荒冷的审美困境	174
第四节 寻找真正的人道关怀	180

第九章 沿袭与变异：苦难叙述的文化审视	184
第一节 文化制约与苦难的观念	184
第二节 苦难叙述的文化整体性观照	189
第三节 原乡意识的乌托邦挽歌	195
第四节 文化他乡与我性苦难	202
第十章 迷失的边界：苦难叙述的现实性批判	205
第一节 现实性匮乏与精神现象学	206
第二节 匮乏的历史和现实动因	212
第三节 寻求生命与诗情的升腾	217
附录 苦难意识与当代小说的信仰叙述	221
主要参考书目	235
后 记	239

导论 穿越现代性压抑的文学苦难

第一节 叙述的背景：雪崩、夹缝与现代性压抑

首先必须要作出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后当代”中国小说，主要是指文革以后的当代中国小说。之所以用这样的词语来概括文革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不是出于花样翻新，而是出于某种无奈。因为在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范式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命名来描述这段时期的文学。尽管文革过后至今的文学不过短短的二十余年，但是如何全貌地把握这二十余年的文学，却是相当困难的。无论是“新时期”、“后新时期”，或者“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等，这些命名都是即时性的，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背景或者时间背景夹带在文学批评之中，但是很难作为一个整体的背景进入文学史叙述，这些词语并不具有文学史的整合功能。本书既然把这段时期的小说作为论述对象，就难免要建立一个具有相对同一性的文学史描述框架。正是如此，我觉得“后当代”是相对较为安全的一种概括方式，一方面，作为一种历史界定，它是虚指的，因而能够跨越和涵盖我们所说的“80”、“90”年代乃至当下的文学；另一方面，它同建国以后的“当代文学”也具有相应的呼应关系，是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延续和文学变异。

如果允许我用几个简约的词语来描述和概括文革后至今当代

中国的文化状况，我想“雪崩”、“夹缝”和“现代性压抑”这三个词语是比较合适的。“雪崩”指谓着存在于现代以来中国话语中的、作为现代传统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当代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权力的同一性的终结。这种终结是具有明确的时代感和群体归属特征的，它主要是指向知识分子族群。在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毫无疑问，这两种意识形态，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仰、伦理、意义体系是起到过重要的建构作用的。唯其如此，这种意识形态叙事的突发性崩解，带给当代文学的震撼才是强烈的；所谓“夹缝”则是指存在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这样两种屡为我们所谈论的话语结构中的，给予我们的那种既有合作又有话语冲突的微妙体验；而“现代性压抑”则是由上述两者制造的产物，它既是我们明确的一种现时代的精神体验和情感体验，在当下语境中同时又是相当程度被遮盖的一种阴影话语。

“奥斯威辛之后再写抒情的诗是野蛮的”，阿多诺在他的《棱镜集》中说出的这句著名的话，既是对“诗”的否定，又是对“诗”的肯定。面对“奥斯威辛”这样的巨大人类悲剧，任何思想和语言都是无力的，甚至思想本身就带有虚假和危险性。而在杀人艺术如此地“现代”之后，现代理性建构的“人”的神庙已经崩溃，艺术该怎样去接续“人的伟大”的香火？毫无疑问，阿多诺是站在反思整个人类文明和艺术本身的批判的立场上说这句话的。如他自己在《文化批判和社会》一文所说，“文化批判必须成为社会的观相学”。他的情感悖论的深处，是人类社会在经历巨大劫难后，人们难以释怀的苦痛记忆和某种绝望；他的逻辑起点，是站在人的归宿和艺术的最高目的上，对人类残存的良知进行最后的吁请。这是阿多诺式的面对苦难的姿态。沿着阿多诺这句话，我想起文革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在类似于“奥斯威辛”的“文革”梦魇被消除，当代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轨道之后，我们的文学如何去讲述苦难？当代中国作家的心灵中铭刻着哪些

苦难经验？这些苦难经验是如何进入他们的叙述流程？他们是怎么叙述这些苦难经验的？这些叙述将会使我们获取哪些生活真相和有效的思想资源？这些问题是我们谈论文学时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虽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和苦难拆解不开，正像尼采论及希腊文学时所指出的那样，希腊文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源自于希腊人内心的痛苦和冲突，而不是源自内心的和谐，但是不言而喻的是，苦难还是有特异的时代特性、文化特性和民族特性的，就像我们无法走进希腊人的气候、战争、神话和雅典城邦，苦难的特异性就存在于其不可取代的文化地理和时代精神地理特性。

因此在本书中，我所关心的不是“奥斯威辛”之后诗将何为的问题。我所要考察的是文革后至今中国文学的苦难叙述情况。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历史时段作为我的论述对象，主要是考虑到当代中国社会以及文学本身在此阶段所包含着的特殊“中国经验”。我试图想揭示的是，在当代中国由失败的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转轨，从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汪晖语）向真正的现代性转变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和人经历着怎样的苦难，我们的文学是如何介入这个苦难现场并叙述这样的苦难的。我对这个历史阶段文化境遇的一个大致的判断是：从我们走出文革的雾霭，进入后来乃至当下仍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现代性压抑的夹缝中。一方面，在经历了百年现代化的摸索，富国强民的梦想和焦虑，失败的惨痛和教训，对于有着深刻的历史耻辱记忆的中国来说，我们对于现代化和全球化有着强烈的渴望和明确的认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渴望摆脱现实的贫困与落后，渴望进入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现代化世界，是我们最基本的心理认同。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运动，无论对于发达国家、

不发达国家，都必然带给它的居民深深的乡愁”^①。对于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来说，在被动地拖入现代化的“他乡”之后，这样的乡愁无疑是更沉重的。而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认同，如何应对现代性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文化冲突，解决这个世界化运动中的“中国问题”，无疑也更加迫切。

这里我无需以哈贝马斯、马尔库赛、利奥塔等的理论来作为自己的立论支持。我的直观感受是：长久的物质匮乏和历史性的礼教，政治社会对欲望、本能、日常要求的道德乌托邦钳制，使多数民众在经济社会迅速形成一种现代性时尚的自我补偿心理。正是在对贫穷、压制、集体、虚假承诺的厌恶中，我们放纵着自我的拜金主义，追求物质享受的原欲，较大限度地释放着个人的情感和欲望；但同时，作为被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裹挟着离家出走，而又无法再回家的人来说，我们的心灵相当隐蔽地承受着对曾有家园的愧疚心理。尤其是在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失范，人们普遍产生信仰危机的今天，我们的潜意识中不能说没有对传统礼教和政治社会那种井然秩序的暗暗留恋，这种愧疚心理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我们在两种心理的夹击下，经受着灵魂和文化分裂的阵痛。这一点，从这些年来学术界的思想分歧、论争的混乱状况也是不难看出的。

而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来看，文革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苦难书写，又带有明显的“现代中国”的标记。它的普遍性，就体现在“革命”时代人们的文化心理的雪崩性失据。因为每次革命或变革，都必然导致政治上、制度上、文化思想上的现代性重组，使得现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异常复杂和尖锐，蕴含着变革社会“丰富的痛苦”。变化无常、模糊不定的社会转换，使得人们真实地把握生存世界变得异常困难，翻来覆去

^① 陈刚：《穿越现代性的苦难》第 114 页，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 年版。

的自我怀疑、批判、否定，往往会导致人们陷入对寄身的世界“不可知”和“不可依”。此阶段的文学亦不例外，拨乱反正的历史否定，意识形态的重新确立，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文化思想的激烈交汇，文化拼盘式的奇异组合等因素，都构成新时期以后特殊的社会语境和文学难以逃离的“语言的囚笼”。巨大转型话语下，苦难在人们（首先是作家）心灵的磨难和冲撞中，以其特有的形式暧昧地展开。

第二节 总体把握：历史、现实、主体

大致来说，当代文学的苦难叙述和以下三种基本苦难境遇有关：其一，当代激进政治制造的历史性苦难记忆；其二，现代转型社会价值冲突、道德重建中的世俗性苦难体验；其三，现代知识“道统”衰落、知识分子话语体系崩解所带来的主体性苦难。

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一些是以压制人的世俗幸福和精神改造为主旨的，尤其是“文革”，不仅造成整个民族的物质性苦难，更是嵌入了深深的人道主义苦难。在历次异变式的精神改造中，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地成为“洗澡”的对象，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经受了种种折磨。“文革”结束后，在现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召唤下，在民族灾难和个体苦难的双重创伤记忆中，当代作家的现代性意识复活了，他们把个人倾诉欲望和疗救社会的文化理想带入文学创作，普遍开始历史苦难的叙事重现，特别是在“拨乱反正”的官方意识形态鼓励下，书写历史，把历史苦难化，成为80年代文学的主要趋向。在以“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为主要创作力量的文学新时期，“伤痕”、“反思”、“知青”文学无不是以揭批历史苦难而形成可以命名的文学潮流。新时期文学的苦难叙述在经历《班主任》、《伤痕》、《芙蓉镇》、《大墙下的红玉兰》、《天云山传奇》等早期的单一历史层面的苦难展示后，很快

就过渡到历史与现实互证式的叙事程式上来：即苦难的历史化和意义叙述的当下化。王蒙的《春之声》、《布礼》，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梁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李晓的《继续操练》……都是在勾连历史和现实，以历史灾难烛照现实的由来，以现实的分裂返观历史的灾难，通过对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的双重叙事，在重构历史与心灵之间微妙关系的同时，把精神创伤延伸到社会文化和政治历史的深层之中。

由于个人经历的特殊性，话语焦虑和当代政治苦难所包含的巨大道德危机和历史沉痛感，以及题材本身具有的艺术张力，进入 90 年代以后，“反右”、“文革”、“知青”、“大跃进”等题材仍然时隐时现在文学创作中，不仅成为王蒙、刘心武、张贤亮、梁晓声、李锐、王安忆、张承志、王小波等“右派”、“知青”作家难以逾越的取材惯性，也成为巴金（《再思录》）、季羨林（《牛棚杂记》）、贾植芳（《狱里狱外》）、于光远（《文革中的我》）、杨绛（《干校六记》）等老一辈作家、学者咀嚼岁月浮沉的主要人生资源（虽然他们文集收录文章时间不一，但成书于 90 年代，此处把它看作 90 年代文学现象），只是在脱离了早期政治反思叙事法则的编码方式后，作家们普遍能够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进行深层清理和批判，比如李锐的《无风之树》，王蒙的“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丛维熙的《走向混沌》、《风泪眼》等，都具有了逼近民族苦难内质，在咀嚼苦难、反刍民族文化心理中透视历史深渊的思想气魄和力度。这些题材对于一些没有亲历历史的作家同样构成无法克制的诱惑，例如尤凤伟写“反右”运动的《中国一九五七》，艾伟写“大跃进”的《1958 年的堂吉珂德》，胡发云、王彪写“文革”的《隐匿者》、《大声歌唱》，李洱的《鬼子进村》，刘醒龙的《大树还小》，何顿的《我们像葵花》、《眺望人生》等

的“仿知青”文学等。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更是把“革命”和人的原欲结合起来，塑造了两个具有特殊审美意义的革命“疯魔症”患者高红军、夏红梅的形象。

政治性苦难对于当代作家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题材选择上的习惯性，实际上还深刻地影响到很多作家审视历史、思考人生的姿态。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不经意间就能从中发现他们总也难以跨越的“身份”障碍，比如“右派”视点、“红卫兵”视点、“知青”视点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蒙和张承志，对于此二人的“少共情结”和“红卫兵情结”，批评界已有不少论述，王蒙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曾不满于自己的作品里有着太多的政治事件的背景，包括政治熟语，我曾经努力想少写一点政治，多写一点个人，但是我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我所期待的成功。”^① 他的《活动变人形》虽是试图表现知识分子精神困境，但写得更出彩的，却是塑造了一组由野蛮、专制、残酷的“封建文化”熏陶出的女性人物。作为一个饱经历史忧患的作家，王蒙的这种和历史纠缠不清的关系同样表现在他的“史诗”情结上。从他的几部主要长篇小说来看，《活动变人形》主要写的是40年代初，《恋爱的季节》是50年代初期，《失态的季节》是50年代后期，《踌躇的季节》是60年代初期，《狂欢的季节》是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期，基本上是一部当代中国的全景叙事。王蒙自己有段话说：“我一直想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回想回想，把自己的经验写下来，这经验是个人的，但也是民族的，甚至也是人类的，中国要搞社会主义，要革命，一会儿又要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一会儿又一大二公，一会儿又‘文化大革命’，一会儿又改革开放，反映的无非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拼命求生存，求进步，还想折腾出点新花样来，这里面的酸甜苦辣，个人的命运

① 王蒙：《道是词典还小说》，《读书》1997年第1期。

会有很多很多故事”。“中国的近现代史整个说起来变动得非常剧烈，有时剧烈得如果离开了历史，就没有了个人了。或者就剩下很少的个人了。这也是小说最难写的地方”^①。潜在的“身份”意识构成他们认识生活、理解生活的基本密码，成为他们参与社会实践、文化实践，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根本方式。在90年代王蒙为王朔的辩护中，有的人就指出，“内心恐惧”是“王蒙的思维特征”，“经历《坚硬的稀粥》风波之后，王蒙的这一思维特征得到了加剧，他竭尽全力与‘五六十年代’这架想像中的风车进行搏斗”^②，“对于王蒙，调侃政治就是一场战斗，一场特殊的战斗。在表面的不在乎、嬉皮笑脸、嬉笑怒骂、满不正经后面，恰好是骨子里的认真较劲毫不放松”^③。

政治性苦难密切联系着作家的个人体验和当代中国的历史实践，唯其如此，这种苦难叙述也充满着历史的崇高感。叙述主体的内心讲坛上，自始至终充斥着英雄和理想主义激情澎湃的声音，无论是在那些展示生命个体的“受难”，还是讲述历史罪恶，无论是表达个人忏悔或者是恐惧、宣判，还是解释历史真相的故事，这样的声音都不绝于耳。阅读这类作品，我们会感到，尽管不同的作家可能会存在历史认知、艺术表现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在苦难的背后，我们会不约而同地看到作为人的最高本质和最高使命而存在一种精神力量，比如自由、民主、正义、爱情、人性等，它们既是一种受难仪式中散发出的上升的、超越性

① 解玺璋、王蒙：《王蒙坦白说“四季” “狂欢”也被泪摧成》，《北京晚报》2000年7月20日。

② 黄力之：《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第24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③ 陶东风：《从“王蒙现象”谈到文化价值的建构》，《文艺争鸣》1995年第3、4期。